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的“泰晤士报”

唐海江 丁捷

摘要

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泰晤士报”是一个被反复言说和运用并贯穿于整个近代历程的西方资源。本文将“泰晤士报”放在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的视野之中,探寻国人言说用意及其重心转移。晚清时期,国人主要将其作为“新报”的构想参照;清末民初党争中突出其“独立报业”的面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的新闻职业进程中,则偏重反思其商业化利弊。至战后国共两党政争期间,“泰晤士报”演变为阶级话语中的批判对象。这一言说重点变迁过程有助于提高中国新闻思想史的思维深度与丰富性,因而“泰晤士报”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占据独特位置。

关键词

泰晤士报、新闻思想史、近代中国

作者简介

唐海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电邮:haijiang_tang@126.com。

丁捷,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dingjie36@163.com。

“The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TANG Haijiang, DING Jie

Abstrac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journalism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the famous British newspaper “The Times” is a western resource that is frequently brought up and used throughout the whole modern history. This paper aims to seek the purposes of citation of the term in the context of journalism thoughts and to demonstrate different images of “The Time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In late Qing, people took The Times as an ideal of “new media”, compared with the

official gazette. In the party politics of early ROC years, its profile of “independent press” was stressed. In the 1920s to 1930s, with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of news, the press was reconsidered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Times.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e civil war between and KMT, The Times was criticized by both sides in the discourse of class struggles.

Keywords

The Times, history of journalism thoughts, modern China

Authors

Tang Haij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mail: haijiang_tang@126.com.

Ding Jie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mail: ngjie36@163.com.

有关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考察，核心议题之一无疑是西方世界如何影响中国。如近来有关中国近代新闻思想起源的讨论，无论是突出中国传统资源的“连续性”，还是将西方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新知”（卓南生，2015：1-29；黄旦，2011），其前提均须承认西方作用近代中国新闻观念和实践的途径与意义。由此展开的论述大致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外人在华办报或交流的具体活动（如早期传教士的办报、威廉博士访华等）（赵晓兰，2011：3-8；邓绍根，2015；徐新平，2002）；二是西方相关理论（如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徐宝璜的《新闻学》）或“模式”（如密苏里模式）的引进与转译（黄旦，2003；林牧茵，2013：1-22）。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西方经典报纸，为国人反复提及和运用，为理解和推进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成为一种符号和集体记忆。其中，英国《泰晤士报》也许是最重要的报刊之一。

《泰晤士报》的发展历史，为世界新闻史提供了丰富的涵义。该报创刊于1785年，当时还靠政府津贴接济，至19世纪初已发展成独立报纸，并伴随着大英帝国走向顶峰，成为世界的舆论领袖。其历史包含了诸多令人钦佩的故事：“大雷神”拒绝政府的扶持；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报道英军腐败迫使英国内阁垮台；甚至为了反抗首相扣留通信而自行设驿传递，等等。（陈力丹，2002：31-40、48；胡泳，1991）其历史包含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不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独立、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力等关键词。

关于《泰晤士报》对于中国新闻史的影响，近年来逐步受人关注。其重点在探

寻清末国人效仿《泰晤士报》的“楷模”效应，（徐培汀，裘正义，1994：278）以此“观察西方报业对中国新闻业草创时期的影响过程”。（林盼）只是其研究时段限于晚清，视野也停留在西方报纸对中国的影响，忽视了近代中国新闻实践的语境及轨迹，对此论题实有进一步申论之必要。

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泰晤士报”绝非只是在晚清被人提及，对于这四个字的使用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晚清时代只是其引入中国的一个发轫阶段。“泰晤士报”从西方引入中国，首先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时人“纽约泰晤士报”、“京津泰晤士报”这种翻译方法的出现，背后是对“泰晤士报”的强烈认同。刘禾提出了“跨语际实践”的概念，来探讨翻译过程中东西方语言文字的交往。她认为，新词语见证历史的变迁，并对历史的变迁进行解读。（刘禾，52）

“泰晤士报”这个词汇从清末伴随着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引入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为中国新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

“泰晤士报”引入中国，不只体现着时人对西方近代历史认知的加深，还伴随着对中国本土新闻界对于“泰晤士报”的吸收和改造。当一组外来的概念或者理论跨越长时段“旅行”时，在中国近代新闻实践所产生的不同语境中，可能会发生变化。萨义德的“理论旅行”观认为，理论或观念的旅行都会有一个起点，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有接纳条件或抵制条件，在被容纳和吸收过程中而接受一定程度的改造。（爱德华，1999：138-139）就中国近代报刊实践来看，“泰晤士报”也因中国报刊发展的不同需求，而完成一次理论旅行。而报刊发展的需求，则是在近代社会的不断转型中而催生出来的。如晚清王朝对言论的压制催生报纸的言政需求；民初党派纷争催生报纸的独立需求等等。不过，这个概念在引入中国后，其并不完全符合萨义德“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泰晤士报”在中国近代史的旅行中，其不同的面相被容纳和吸收，本土化的结果却并没有结出果实，最终却是在政治的尖锐对立中，被驱逐出新闻界的话语体系。如果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四阶段诠释了理论的完美嫁接过程，“泰晤士报”的理论旅行则从一个反向方面，证明了理论的“接纳条件”和“抵制条件”受到政治的制约，并且“抵制条件”可能强大到击败“接纳条件”，使得“理论旅行”出现戛然而止的局面。

本文拟在参照萨义德“理论旅行”的相关观点来探讨，当“泰晤士报”在不同的时空中被使用时，究竟呈何面相？其中有何以及如何转变？对于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而言，“泰晤士报”究竟有何意谓？

一、晚清：用“泰晤士报”来建构“新报”观念

从第一批留英人员真正接触到《泰晤士报》开始，清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泰晤士报”的吸收是全方位的。“泰晤士报”被用来证明报纸印刷技术的重要、报纸对开民智的帮助、对强国所起的作用等等。这展现了“理论旅行”初期知识分子对于“新知”的渴望，时人常用“新报”来表示这样一类的西方报纸。对报纸多种功能的全面吸收，反映出人们借用“新报”不只是为了满足言政的需求，更是把报纸看做改造社会和国家的一种手段，体现了“泰晤士报”在引进初期人们对报纸的全面探索。

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清末早期的留英人员，应是较早关注《泰晤士报》的群体。1866年，总理衙门派官员斌椿和京师同文馆的三名学生访英，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访外使团，而《泰晤士报》则给当时年仅18岁的张德彝留下了较深印象。他在后来写作的《航海述奇》中说：“其泰晤士时报自是创始至今，几二百年，报中议论公允，叙事确凿，因之万国传观”。（张德彝，1997：130）随后十多年，包括清政府首批派出的海军留学生严复，清政府派驻英国的官员刘锡鸿、郭嵩焘和薛福成等，对《泰晤士报》多有描绘。此外，少数赴英的个人（如王韬）对《泰晤士报》也有着记述。

这批能够直接入英并有幸参访《泰晤士报》的士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报馆机器。如中国第一任公使郭嵩焘1877年参观泰晤士报馆时，详细记述了该报检字、排版和印刷等技术操作程序，惊叹于该报的印刷速度及效率：“每日印刷新闻报七万纸，不过一点钟可以竣事。三佩宜得新闻报一纸，每纸二大张，表里两面各得四板，计十六板。凡一施令得新闻报四纸，七万纸抵一万七千五百佩宜，合金洋八百七十五磅。所用工力三百余人，日间不过数十人，为英国报馆之最巨者。”（郭嵩焘，1984：125）。

早期出国者主要是洋务派的实践者，自然对作为新技艺的西方印刷术感兴趣。这也是国人所关注的。《万国公报》刊文就描述称：“若英国《大英士时报》，……印法之速，不须加纸上墨，惟用火轮机器，每半时许可得一万六千张，虽售之甚远，亦神速也。”（花之安，2012：89）《泰西新史揽要》一书记载当时人们对于印刷术的印象：“一千八百四十年，泰士报得一新法，用德国人所纸火轮机器以印报，每一点钟可印一千一百纸，亦自以为速矣，又阅多年未之能改，近年始迭出新机，往往后来居上……且送入机器时不过空白纸一大卷，及至出机则已印成幅，兼折叠装成书，其为便捷尚可计哉？又有另浇铅之法，但将各自排成一幅，

顷刻间浇出铅板多块，分装机器而刷印之，则便之又便矣。”（1880/2002：155）

当然，《泰晤士报》最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其作为世界舆论领袖之影响力。就此，作为传统士人，他们习惯从清议角度对其作用进行阐释。上引张德彝所论即是一例。科考失利后游历英伦的王韬（2013）如此评价西方报纸，“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勿期诚正，”尤其是《泰晤士报》，“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该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去向也。”以报自现由此成为其人生重要选择。

相对于以台谏、乡校和书院等“清议”通道，《泰晤士报》则为国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言论空间。郭嵩焘（1984：401-402）以“《戴模斯》”（《泰晤士报》）阐释报纸与国政之关系，认为“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刘锡鸿（1986：73）认为，“戴晤士”等伦敦新闻纸，“乃清议所系国主每视其臧否，为事之举废张”，“论政之有所，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皆于是乎著”。郑观应（2013a：123）从清议出发，论及主笔品格之于报馆言论的作用：“英国《泰晤士日报》馆主笔者，皆归田之宰相名臣，自然无勒索财贿，而名驰中外矣”。宋育仁（1998：379）认为，西方报馆为“清议所在”，“英国报《泰晤士》最著”，“主笔者皆必有品望、学望，由学会所推，即其国之清议所在”，盛赞该报：“报无不实，论必持平，余家不及”，因而言重于国。此时《申报》（1873）的文章也赞扬《泰晤士报》“总主笔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宰臣之所操者，朝权也，而总主笔之所持者，清议也”，进而判定：“清议之足以维持国是，泰西诸国皆奉以为矜式。”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展开，国人自办报刊渐入高潮，对此不乏在华外报的直接经验，但“泰晤士报”在型构“新报”中的地位似不应小觑。在早期改良派郑观应、陈炽等人眼中，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泰西报馆“实足达君民之隔阂，遂听其开设，以广见闻，迄今数十年，风气日开，功效日著”，提出中国人办报应以其为模板。即使是相关规制，也希望“一切均仿泰西报馆办理”。（陈炽，1997：106）至维新变法时期，变法人士着意于新报之于变法的价值，其办报倡议往往以《泰晤士报》为蓝本。

如，梁启超（1999：66）等在发刊《时务报》时以中国的《泰晤士报》自期：“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报》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惊羡

之情溢于纸面。康有为在主持变法期间多次论及新报的价值。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提出要关注《泰晤士报》：“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晤士”（康有为，1981a：159）他批评清廷官报“视各国官报，规模相去远甚，非所以崇国体、广民智也”，依此提出，“大抵报馆愈多者其民愈智，其国愈富且强。其中如英之《泰晤士报》……号为官报，风行天下”。（康有为，1981b：322）由此，“泰晤士报”成为开民智、图富强的新报样板。

这似乎成为当时维新派人士论述的基本样式。严复（1996：59）等人在1897年创办《国闻报》称，“略仿英国《太晤士报》之例，日报之，继以旬报，五月而后”，以达“上下通”、“中外通”之目的。吴恒炜（1999：89）在阐述《知新报》缘起时也称赞《泰晤士报》：“胥天下之心思知虑，眼目口耳，相依与报馆为命，如室家焉，是以英之霸也，《太晤士报》五六十万，甲海外焉”。章太炎（1977：29）在为《实学报》作序时也提及，“大坂之报，一日而籀读者十五万人，泰晤报，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人”，对《泰晤士报》似颇为折服。

这一论述方式并未因变法失败而有所减损。随着20世纪初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加速，国人进一步看到《泰晤士报》之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价值。1902年，英敛之在开办《大公报》时称：“夫欧西各国所以开民智、强种类者，莫不借报馆之功，而其最隆盛见重于天下者，则莫若英之泰晤士报馆”，赞扬该报所登“皆备弥求备，精益求精，……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此西人所以智识日开，学问日进，阅历愈广，技艺益精者，报之功也”；进而提出，内容上应循《泰晤士报》体例：“体裁不妨如《泰晤士》之规则，分内政、外政、杂事三类。凡国家举措之得失，则以内政统之；邻邦政教之损益，则以外政统之；至工商之盛衰、器械之利钝，则以杂事统之”。（英敛之，1902）这也引致当时读者称道，“其不畏强御不避嫌怨之宗旨，直与伦敦《太晤士》相颉颃”。（皖北山民尊虞氏，1902）

并且，随着20世纪初年“万国”时代到来，国人也开始越发重视报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浙江潮》在论述报馆在维护国际秩序时，以《泰晤士报》为典型：“盖新闻纸贵具世界的主义，不区区于国家界，而有彼我之见存以媚世俗耳目也”，并指出普法战役后俾斯麦欲重出师，“伦敦泰晤士报恶其阴谋”，由此盛赞，“令世界人民不无端而罗战祸者，舍报馆其谁能之？”（筑髓，1903）

对于报刊之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东方杂志》刊文倡议中国创办新报，也

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泰西报馆为重点：“泰西各国，以报为养命之源，资生之具，故民智日开，国势日涨，富强之机，不可阻遏”，进而力劝民间多设报馆，宣称：“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东方杂志》，1905）《泰晤士报》由此为认知新世纪提供了一种视野。

从清末到20世纪初，在国人关于“新报”的构想中，“泰晤士报”一直是言说的重心。无论从传统思维视野抑或现实变革层面，新报的概念透过“泰晤士报”的言说获得较为具体而深入的诠释。这种“新”并非停留于器物技术层面，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清议功能，而是观照到国强、民智，进而扩展到对于时代认知的层面，“泰晤士报”俨然成为近代中国“新报”的基本模型。

二、民初：“泰晤士报”成为独立报纸的符号

晚清国人主要将“泰晤士报”理解为超越传统邸报的“新报”，而至清末党派政治乃至民初党争政争的激烈化态势下，对“泰晤士报”的言说重心出现了侧重和倾斜，“泰晤士报”成为“独立报纸”的一面被迅速凸显出来，人们希望通过对泰晤士报独立品格的强调，纠正民初报纸相互攻讦、朝秦暮楚的不良风气。

实际上，在清末本土报纸刚刚兴起时，报纸的独立问题尚未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得到重视。如，郑观应（2013b：127）认为，主持清议之权，应当“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其意尚指言论的“中立”、“客观”，并未有“独立”之指向。这一点直至清末民初党派渐起似乎才引发重视。

如此论述的形成有赖于清末以来中国党派政治之形成，进而影响到报纸的风格。有论者谈及维新运动时提出强学会即中国的政党，这或许不错，但如果说《时务报》即为党报，似有所夸大。不过，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主持《清议报》时提出“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之说，显然对于党派及政党报纸有了明确印象，由此可知清末党派报刊论争、进至民初政争党争的激烈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狄楚青。1904年6月12日上海《时报》创刊，狄楚青便在报头上打出了“Eastern Times”字样，寓意“东方《泰晤士报》”。其创刊词称：“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意见。”（《时报》，1999：132）该报创办本得到康梁的资助，在人事上也多受干预，但狄楚青其后对康梁若即若离，多有抵触，试图从党派之中抽身，种种努力不难发觉《泰晤士报》的影响。

如此态势至民初更为明显。民国甫成，党派林立，报章蜂起。报纸为党派利益

而罔顾事实、肆意攻击之现象屡见不鲜，进而演化成为党派斗争“大活剧”。对此，时文批评称：“各挟一党同伐异之见，横亘于胸中，其真能以正直之眼光，公平之心肠，按脉切理，考求其是者，不数数见；而为是故，激哀之词，一偏之论，利用社会薄弱之心理，以沽庸俗人之谀称”。（民国汇报，1913）身陷党争、政争中的报人反思民初舆论，以期建立健全独立之舆论，“泰晤士报”更是引起人们重视。

对于言论独立，深受英国政党政治影响的章士钊以为，多党之下的新闻言论，不如两党之下公正，所以中国新闻界应该保持独立，“在政党政治之国，其新闻之言论，恒不期而分为两党”。而中国现实的环境是党派林立，政党报刊也并非真正代表党见，而仅是为了私利，“不足以促进政党政治而转以贼之”。（章士钊，2000a：409-410）在其接办《民立报》时提出，“本报不存党见，不立异同，苟所言无私，立论可采，无不顺次刊登报端，公诸天下。”（章士钊，2000b：151）

《民立报》本属党报，章士钊之举很快招致国民党党内讨伐与攻击，特别他提出“毁党造党”之说，最终导致其离开该报转而自行创办《独立周报》。不过，章所言的独立主张并未随之散去。1912年，于右任针对章士钊遭讨伐事宜，论及《民立报》的独立问题。他反对将《民立报》作为党同伐异之工具，而是“欲《民立》为东方《太晤士》”，并提出其首要方法，“务在养成立言信用，不作过激之谈，亦不作过偏之论”，进而昌言：“今之《民立》，不欲挂一怒气冲天之招牌，此物此志也。”（于右任，1986：237、241）身处党内漩涡中，于氏此言，足见“泰晤士报”在其心中份量了。

《民立报》另一篇笔名“说难”的文章也引用“泰晤士报”阐明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抉择时论之人，同时即为发表意见之人，发表意见者亦然。倘国人能不轻发意见则本篇可以不作。又同业中往往有各为其党拥护，乃至出言无择者。英之泰晤士，非所称统一党之机关报乎？试观其态度如何，可以省悟。吾闻以身殉道矣，未闻以身殉党也。”（说难，1912）

所谓“殉道”，其意并非意味着独立报纸即能代表真道，但显然排除立言前即有立场预设的党见。由此，相对于“殉党”，“殉道”的意境也就更高。民初政党政治破裂，另一位从英国归国的杨端六在回顾此段历史时也有此种意识。他认为，民初党派分立，“彼此大张旗鼓，不相上下”，以党派利益为主，忽视国民利益，解决方法是集合各派中之最优秀分子，超越一党一派。从这一点上，杨端六（1921）称，“伦敦泰晤士所以世界有名，因为十九世纪中有一个很好的主笔叫做

迭连，议论内政外交，不依党派为标准。”显然，杨端六也是站在“殉道”的立场上，进而提出独立报业的“传道”之责。

民初舆论界引入“泰晤士报”，其目的显然是针对两党之争，试图超越其上，实现言论的独立。但要改变此种局面，并非易事。一方面涉及到政党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报界自身变革也很重要，但并非局限在言论本身上了。言论的前提是事实。有论者就此说：“欲造成真正之舆论，不可不准据精确之事实；重论说而轻纪事，此为现在一般新闻之恶习，健全之舆论，末由发生，盖即以此”。（独立周报，1912）而事实的收集、整理和把握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这一点可能是当时政党报纸主持人所应深究的。

对于民初报纸经济问题，政党津贴一直饱受垢议，但并不能就此以为报界缺乏经济独立的观念。章士钊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报纸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并能保证采访的基本要求，有必要组织报业托拉斯：“伦敦《泰晤士报》之特派访员布满全世界，其数乃达六十人之多，薪资及旅费、电费种种”，就是因为有“绝富之财力”，（章士钊，2000c：497）他对中国报业托拉斯的设想是：“合其财力，并其机器字粒，如机器有余，则直由托辣斯购来而搁置之，……裁其执事人员，各社记者通力，而合力派遣国内外之通信员，重其薪资，使专责成整顿广告，使其所登之字数、与日数，与价目相应”，由此“新闻之根基庶乎可稳，而新闻之价值亦日以高”。（章士钊，2000c：500）其在另一文章中进一步介绍伦敦泰晤士报之页数，以示该报刊载事实之丰，实与我国成为巨大对照，以期引起国内对此问题的重视。（章士钊，2000d：565）

上引杨端六谈及报刊“指导舆论”时指出，独立舆论之出现，除了好的主笔，还依靠一个“不党不偏”、“热心公益”的报老板。他联系民初以来中国报业状况指出：“今日的新闻能够养活自己的恐怕很少，一大半都要靠党派或政府的接济。若是真正的主持公论，在急进的看来，固然不满意，在缓进的看来，也不满意；在国民党看来固然不满意，在进步党看来也不满意；并且论调太公正，销路也不容易扩张。所以新办的报，除非是有一二大资本家懂得上面所说的道理的出来维持，决不会办成功的”。（杨端六，1921）这一观察放在民初政党报纸衰落情形下就更为现实。

其后，邵飘萍以个人力量办报，对于资本对言论独立的重要性更有体验。在其心中，《泰晤士报》似是标杆。他赞叹称，“英之诺斯克利夫，……以资本雄厚、设备完全、足以执世界之牛耳。”（邵飘萍，2008：202）而上海报纸除了《申

报》和《新闻报》之外，其余报纸“仍未脱离津贴与机关新闻之苦境”（邵飘萍，2008：193）。尽管后世批评邵氏接受各方津贴，但由此可见其对《泰晤士报》经济独立颇为向往。《京报》创刊三年后，邵飘萍宣称：“愚个人既素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实力为报纸之后盾”，（邵飘萍，2008：216）也在说明此意。

可见，清末民初关于“泰晤士报”的言说，乃是基于此时党派报刊中报界自身的一种纠偏，一种反观。借此描绘出“独立报纸”的意义：其不仅包含言论独立，而且延伸到新闻、经济等层面。这些意义进一步衍生出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关键命题。

三、二三十年代：新闻职业化中对“泰晤士报”的反思

报纸独立的背后，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在支撑，比如报人的观念，经济的自足，对于政治的警惕等，而这需要新闻界的职业化来支撑。“五四”以来，报人对于报纸的认识大大加深，新闻职业化的观念凸显出来。“泰晤士报”作为一度并入北岩报团、后来又独立出来的报纸，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国新闻界对于新闻职业化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反思的样本。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反思并非像之前一样单纯是对“泰晤士报”某一面相的推崇，而是包含了批判的成分，如对舆论操控的担忧。整体来看，报人对于“泰晤士报”依然是接纳的，但是已经有了抵制的成分。

关于中国新闻职业化观念之形成，目前学界大致认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一书为根本标志。《新闻学》一书以美国商业化报业为主旨，对近代中国新闻思想之演变产生了关键作用。如有关“新闻”的定义、报业从“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营业本位”的转变，（徐宝璜，2008：151-152）并适应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环境，为中国新闻职业化拓出了一条道路。与此同时，引发的争论与反思也接踵而来。此时“泰晤士报”成为不可忽视的论述对象。

“泰晤士报”被人引述，源于北岩爵士对于该报的改革。20世纪初，北岩爵士购入《泰晤士报》，并仿照美国商业化模式改革，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这引起国内报界普遍关注。特别是1921年北岩来华访问，并与京沪等地新闻界交流，国内对其商业化模式有更深入的了解。¹如，任白涛将这一商业化模式称为“美国式”，他指出，“二十世纪之《泰晤士》受美国式之影响，欲赓续19世纪之状态，断乎不能。其结果，昨年来华之诺斯科克利夫爵士之资力侵入，泰晤士旧来之面目乃大变。”（任白涛，2011：116）“美国式”报业改变了《泰晤士报》的命运，也

深刻影响了国人办报的认知。黄天鹏（2010：158）就认为，北岩访华，给国人办报观念之直接刺激，“为新闻事业企业化一种策励。”钱伯涵、孙恩霖（1936：3-4）等也强调：“我们可以认定办报的目的第一系要博得商业上的赢利”，于是，“报纸系商品”、“营业本位”等观念蔚为大观。正是在此背景下，报界人士以《泰晤士报》为对象，对新闻事业商业化模式的利弊进行了深入反思。

如邵飘萍，一方面对这一模式带来的经济收益颇为认同：“盖世界新闻事业之最发达者，首推英国和美国。两国中所称为新闻业之王者，如英之诺斯克利夫、美之哈斯彼脱等，……皆以资本雄厚、设备完全，足以世界之牛耳；而其收入之富，纯益之多，更可资以扩充，而愈促其进步。故新闻纸应完全作为商品之主张，遂至风靡全球”。但即使承认这一世界风潮，对其也非完全认同：“自新闻纸完全商品化而后，以发行为手段，以多揽广告为目的，其种种大规模之设备，不可无巨额之资本，于不知不觉之间已陷入资本主义之旋涡”，批评此种“营业本位”的观念，“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邵飘萍，2008：202）对其资本主义充满警惕。

尽管对于商业化即资本主义化，此间尚有反驳，²但这一反思一直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一种明显倾向，尤其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无疑成为新闻界的焦点问题。这一点在成舍我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在20年代初，成舍我深感言论受制于报老板，提出要创办“大报馆”、“大书局”，然资本匮乏是其瓶颈。（成平，1920）1929年至1930年成舍我参访伦敦，此时泰晤士报已从北岩家族手中转入阿斯特家族，这使其对北岩的做法有更直接也更冷静的旁观。他一方面认同北岩的大众化报纸策略，认为其“兴趣、廉价政策，诚足以贬损报纸之价值，然二十世纪之报纸，其目的绝非仅止于供给一部份知识阶级。欲求报纸销行于一般平民，自非浅显生动之文字及最低之售价，不能奏效。”同时也不乏批评：“所惜者，即此种政策，有时行之过当，且其大部份动机，多半出于资本家获利之一念，而非欲供给一般平民以何种善良之知识，此则吾人所不能为此严讳也”。（舍我，1931）但重心还是在于后一层意思：“现在的报纸，完全成了资本主义下的产物，所有在主张方面，只顾及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谓公众福利，实际上全是空话……现代报纸发达的一种不幸的结果”。（成舍我，1931）后来成舍我基于此构想出一种所谓“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老百姓说话，政府认真扶助、依法管制”的新方案。（成舍我，1944）

随着30年代《申报》与《新闻报》等大报商业化趋势日益加剧，这种批评越发

尖锐。袁殊（1931）指出：“现在当着上海这些报馆主人的都是商业经纪人的买办阶级，或竟是依附帝国主义而存在的资本家。资本家所经营的报纸的表现就是营利，企业的意识的全部。”郭箴一在描述30年代上海报业状况时，以中国报业资本受制于帝国主义而称为“奴隶化”，受制于少数人而称之为“独占化”，认为其根源在于“报纸营业化”，此乃“中国报界之死命”。（郭箴一，1931：31）

对于报纸商业化之反思还触及有关中国报业托拉斯问题。如上节所述，报业托拉斯在民国成立前后本为独立报业的重要条件而被言说，但随着人们对于商业化危害的了解，遂对其警惕起来。如此自然与《泰晤士报》被纳入北岩报团这一事实相联系。上引邵飘萍（2008：202）之言，“其种种大规模之设备，不可无巨额之资本，于不知不觉之间，已卷入资本主义之漩涡，资力薄弱者，有无法竞争不能存在之势”，也在说明这一趋势。这种担心随着《申报》主人史量才试图收购《新闻报》之举加大。黄天鹏以北岩报团为例，说明报业托拉斯蔓延至国中之趋势：“Sir Northcliffe 止以泰晤士与密勒之势力，即称为舆论之制造者，其势足以去留内阁，而其无冠帝王之威权，而成舆论执论之时代。此种托辣斯之趋势，已由一地而至全城，由一城而至一省，由省而至全国，由欧洲而至美国，而渡海东来，在中国资本主义亦已侵入新闻界。”对其危害，他指出：“由资本主义发达之结果，而新闻事业遂卷入托辣斯之怒潮，以金钱而垄断舆论，操纵报业之形势既成。”（黄天鹏，1930：158-161）并且，依其判断，北岩访华“启示了几个中国报业的中心人物此后的作为”，特别是为“中国新闻事业带来托辣斯的发端”，而史量才收购《新闻报》等举措，即“受北岩爵士的影响”。（黄天鹏，2010：158、160）

报业托拉斯也引起胡政之的担忧。对此他指出，“为免除过度商业化的流弊起见，希望报纸不要办得太大，并希望地方多办各种适合各种环境的报纸，更不希望像外国由报业托辣斯包办舆论，因为那在中国是不可能而在实际是有害的”，提出要打破“新闻纸是资本主义产物”的思想。（胡政之，2011：497）如此，报人不再简单地把托拉斯作为灵丹妙药，反而产生了抵触情绪。这和辛亥前后章士钊等人对于报业托拉斯的认识正相反对。

《泰晤士报》无疑为民国新闻界理解报纸商业化提供了深入反思的机会，由此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职业化乃至整个新闻业的路向。但中国新闻职业化面临的难局是，一方面担心资本主义对于报业的控制，进而完全被其操控；另一方面又期待自身势力强大，以便在与权力机构的博弈中维护自身。因此，如何理解报纸与政府的关系则是职业化进程中另一核心问题。在此，《泰晤士报》与英国政府的关系又成

为反复引述的内容。

对于《泰晤士报》监督、制衡英国政府的地位，报人们多有明确认知。如徐宝璜等（徐宝璜、胡愈之，1924：86）对此赞誉有加：“今日《泰晤士报》对英国政府，处于完全监督地位，其实力足以左右秉政之大佬。”汪英宾指出，报社除了有监督政府的政治责任外，还有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英伦之《泰晤士报》，为世界各国最注意之报，对外交问题所发表意见，往往为各国外交家所采纳……故于编制外交新闻时，宜十分谨慎，务以发扬国光，增进邦交为责任。（汪英宾，1999：86）

成舍我的认识在此点可能更进一步。在其看来，泰晤士报本身具有保守主义色彩，这与我国报纸“一方面环境压迫、不能为自由之表白，一方面报纸自身亦乐以模稜游移之说，博‘中立’、‘不党’之美名也”显然不同，由此才使“符离街（Fleet Street）之势力在英国得一均衡”。虽然他意识到《泰晤士报》的阶级性质难合“民治潮流日见发皇”之中国，但对《泰晤士报》与政府关系十分羡慕：“惟遇所乐为称道英国新闻事业者，报纸对任何政治问题均有迅速明确之批评，而政府当局及各党领袖，亦能虚心考量，不至以‘反动’或‘废话’目之，吾人固不欲赞美英国之报界巨头，然此种符离街（报馆）支配唐宁街（政府）之精神，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视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舍我，1930）

不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何与政府建立良性的制衡关系，一直是民国时期职业报人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日本的入侵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更加突出而紧迫。此时《泰晤士报》一战时的表现尤为令人关注。

此时，关于德皇威廉二世将一战失败归结于北岩及其《泰晤士报》的论述频频被引用。张友渔（1988：66）引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皇威廉第二和兴登堡将军都承认，德国不是失败于军事，而是失败于新闻。假使他们有《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新闻，他们将不致遭到惨败”。《新闻杂志》的文章也说：“观欧洲大战时，协约国的努力于宣传战，而终于获得胜利可知，……如德废帝威廉第二于大战后所谓：‘此非战之罪，而系德国无泰晤士报之故’”（凌遇选，1937）。任白涛（1938：7）德国战败，“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宣传”。赵占元（1937：39）也以为，战时《泰晤士报》已成为英帝国对内对外的代言人，它“并不是一家报纸，而是一家保护英国国家利益的机关，”以此突出报纸对于政府和国家的责任。

尤有意味的是，一战时期北岩通过在阵前散发传单致使德军军心大乱，进而被

人称为“纸弹”、“墨弹”，这一比喻也被国内报人借用以阐发报业之于抗战的作用。成舍我（1939：91）在《‘纸弹’亦可歼敌》一文中引用德军一战将领鲁登道夫之语说，“同盟国不是败于协约方面的铁弹，而是败于北岩的‘纸弹’”，进而阐述了战时宣传如何到民间去的问题。马星野（1938）联系中国抗战实际认为，中国报纸的作用与其说是直接来歼灭敌人，不如说是间接来推动人力物力；与其说是子弹，不如说是煤油”，将此点引入深处。

如此引述，其意并非“符离街”指导“唐宁街”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报刊如何调整角色以服务于国家抗战大局。如张季鸾一直想办一份像《泰晤士报》一样的大报，他认为“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他提出，报纸要做“严格受政府统的公共宣传机关”，“贡献一张报纸于国家，听其统使用。”（张季鸾，1946：151-152）

张季鸾反映的是自由职业报人在国难面前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对于国民党报人而言就更自然不过了。在詹文滢眼中，北岩和他的《泰晤士报》在一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其因在于报纸和国家保持了如此关系：“它只是在少数极端场合反对政府，大体都拥护政府”。因此，报纸评判事情就应该像《泰晤士报》一样，“仅从该事本身的功过着想，凡有利于国族者，他全力支持，否则它就毫不迟疑，予以断然的批评和挞伐。”（詹文滢，1946：37-38）

综上观之，在民国新闻职业化观念的推进中，不论是出于对中国报纸商业化的利弊反思，抑或政府与报业关系的探究，甚或抗战时期报纸角色的认知，“泰晤士报”均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也因由关于“泰晤士报”的诸多认知和探讨，推进了近代有关中国新闻职业化问题的探讨。

四、40年代以来：国共党争中泰晤士报“旅行”的中止

从晚清到抗战，“泰晤士报”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从新闻思想层面而言，一直具有制度移植的效果，为人们接受与认同。无论晚清的全方位推崇和引进，还是“五四”以来对其托拉斯化的警惕，“泰晤士报”作为效仿的对象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40年代后期，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大变局中，“泰晤士报”就不再是热衷的对象。其间虽有自由报人倡导《泰晤士报》的办报理想，希望走“第三条道路”，但很快淡出了历史舞台，甚至成为反面的对象。“泰晤士报”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中的“旅行”逐渐中止。

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民营报人中，储安平或许最具代表性。储安平游历英

国时，掩饰不住对于《泰晤士报》的钦佩：“英国报纸除在习惯上不批评英王及王室外，对其他任何政治领袖，均直言批评，无所畏惧。”（储安平，2005：128）参观英国的经历，对英国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比如英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发表政论不构成犯罪等，深刻影响了他的办报实践和办报理念。冯英子（1994）提到，“储安平对于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然而，储安平创办的以敢言、犀利著称的《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后（不久改名为《新观察》），在内容上没有了往日的锐气，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了图案。”（谢泳，2005：137）且这份《新观察》只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在国民党新闻宣传的话语体系中，英美法式的自由主义新闻事业，并不是理想的新闻事业。马星野受过西方专业主义新闻教育，对于《泰晤士报》也非常赞赏，认为《泰晤士报》是少数的“历史铸造者”和“金钱铸造者”兼备的报纸（马星野，1941），但这一典范显然难合其“三民主义新闻理论”。在其看来，《泰晤士报》和英美其他报纸都并无差别：“英美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特权阶级之报纸，很少有代表全民说话的报纸，只有百万富豪，才有在伦敦纽约办报的能力，他们维护这阶级利益，是十分明显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马星野，1939）

在中共的新闻宣传体系中，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共党报上是一次重大改革，这次改版目的是使《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毛泽东，142）阶级分析的观点尤其被强调。在此话语体系下，欧美报纸往往被作为批判的话语加以使用。陆定一（1987：6）所言颇具代表性：“我们的新闻工作，既然尊重事实，那末我们不但与专吃造谣饭的法西斯不同，而且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不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多篇文章批评西方资产阶级记者“无冕之王”的称号，³认为本质是为“人集团”和“剥削者”服务。（解放，1942）《泰晤士报》显然属于批评的对象之列。

在和国民党的宣传较量中，中共看到了《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舆论的强大，利用西方媒体对于国民党的负面报道来反击国民党。如胡乔木在揭示“国大”的虚伪性时，曾引用国外媒体的评论：“在国外，不但苏联的广播评论员，而且英国的泰晤士报，……以至替蒋介石捧场的纽约时报，都共同宣告蒋介石“国大”的欺骗性、分裂性和失败性。”（胡乔木，1992：281）这种助阵并不意味着中共对《泰

晤士报》的肯定。中共对于《泰晤士报》实际上是从两种角度来观察的：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该报是反动的；从具体的业务视角，该报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在中共“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思想主导下，对于“技术”的崇拜往往被视为“反对党性”、“反对群众性”的表现（解放，1943），《泰晤士报》在“技术”上的价值几乎也就被稀释掉，甚至被贴上反动的标签。胡乔木在一次培训班的讲座上说：“纽约时报非常反动，但不能说他们的社论不重要，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也是如此。”（胡乔木，1999：144）同一年出版的《欧美主要报刊及通讯社介绍》则引用了列宁的话，评价该报为“最保守最资产阶级的报纸”，“实际上表现英国统治集团、特别是英国外交部的意见”。（军委联络部，1954：86）这时，中共学习的对象绝非《泰晤士报》这种欧美大报，而转向了苏联。此点正如范长江（2001：1123）所言，此时，“列宁办火星报、斯大林办真理报”才应是中共努力学习的“国际经验”。

由此可见，“泰晤士报”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的“旅行”中，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逐渐淡出，其原因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有关。抗战结束以后进入国共内战阶段，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党报所发挥的作用，而随着“第三条道路”的破产，民营报纸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最终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近代以来，把“泰晤士报”作为效仿对象的，主要是民营报纸。民营报纸的消逝，“泰晤士报”在中国也就失去了效仿的主体。而无论和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党报都对于“泰晤士报”近乎全部抵制，“抵制条件”远远超过了“接纳条件”，“泰晤士报”的理论旅行也就停止了。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梳理可知，在这场百余年的跨语际实践中，国人对“泰晤士报”的言说用意与重心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移过程。在晚清时期，国人对于“泰晤士报”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其舆论功能上，由此该报成为“新报”构想之模板；在民初党争之下，主要突出其言论独立、经济独立的价值；在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泰晤士报”则成为人们反思新闻商业化、报纸与政府关系等问题的对象；至抗战后国共政争时，则由于阶级话语和党派话语而被赋予反面的意义。

可见，不同时代的新闻实践活动有着不同的主题，对于“泰晤士报”多种面相也就有着不同的强调。从总体上看，“泰晤士报”在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旅行中，经历了由被全方位的吸收到有选择、警惕性地吸收，再到被完全排斥的过程。这反映了中国新闻实践活动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增强，同时也显示出“理论旅

行”本身的复杂性，引入的理论不一定被顺利地接收和改造。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和思想领域经历了一场由西到东的“制度移植”过程。国人对于“泰晤士报”言说和使用，可视为这一“移植”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情节。刘禾（2006：228-229）认为，“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通过对“泰晤士报”引入中国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个概念不只是促成概念本身的再创造，更是中国新闻实践活动不断变换和前进的催化剂。“泰晤士报”这一“他者”进入到中国语境并被使用，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诠释，主要是源于本土语境之出发与需要。因此问题的重心并非是否存在误解，而是如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加以使用。也是在此层面，“泰晤士报”不仅仅是一个“他者”，而是直接参与到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这一主体的建构之中。如，借助“泰晤士报”的言说，国人能够将西方自由报业之诸多议题较为全面地展示出来。也是在此过程中，国人逐步明确了“新报”的内涵和样态，提出对于事实的重视、经济独立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泰晤士报”的商业化问题、阶级性问题等的不断反思和讨论，有助于推进时人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提高中国新闻思想史的思维深度与丰富性，进而明确中国新闻事业之进路。

毋庸讳言的是，“泰晤士报”这一话语本身并非严格的规范性，特别是相对于某种系统的西方新闻理论或“模式”，有关“泰晤士报”的言说并非那么系统和合乎逻辑，但因其直观和具体的特征，往往容易为社会接收与运用，并且引发多义、多元的解读，这可能是某种规范化的理论所不具有的潜质。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时，不应忽视其独特的作用和地位。

注释 [Notes]

1. 注：北岩爵士1921年11月访华，先后至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等地参访，与京沪报界交流，并参观了《申报》、《新闻报》以及望平街。其行程参阅叶冲、庞荣棣：《北岩来华路线及史量才彼时行踪》，《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第124-127页。
2. 如燕京大学的马丁富就否认“报纸商业化就一定以赚钱为首要的意思”，并坚称“商业化非特未损害报纸的势力，而反使它更为稳固”。马丁富：《现代报业的使命》，载方汉奇主编：《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第3册，第461页。
3. 关于“无冕之王”在近代中国的际遇，参阅姜红：《现代中国“无冕之王”神话的建构与消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3期。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爱德华·W.赛义德（1999）.《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 出版社.
- [Edward W. Said (1999) . *Edward W. Said's Self-Selection (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陈炽 (1997) .《报馆》.载赵树贵、曾丽雅 (编) ,《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
- [Chen,Zhi (1997) .On newspapers,In Zhao Shugui&Zeng Liya (ed.) ,*Collections of Chen Zhi's work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陈力丹 (2002) .《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Chen,Lidan (2002) .*World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成平 (1920) .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新人杂志》,1 (5) ,1-7.
- [Cheng,Ping (1920)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future large-scale culture movement. *Junior Magazine*, 1 (5) ,1-7.]
- 成舍我 (1931) .世界新闻事业的发达与中国报纸的前途.《民众周报》,(182) ,1-4.
- [Cheng,She-wo (1931) . The boom of world jour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newspapers. *Mass Weekly*, (182) .1-4.]
- 成舍我 (1939) .《“纸弹”亦可歼敌》.载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编) ,《战时新闻工作入门》.生活书店.
- [Cheng,Shewo (1939) . "Paper bullets" may also kill enemies. In China Youth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ed) ,*A guide to wartime journalism*. Life Bookstore.]
- 成舍我 (1944) .报纸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中国新闻学会年刊》,(2) ,20-30.
- [Cheng,Shewo (1939) .How will newspapers be "Really" the representative of public opinion. *Annual of Chinese Journalism Institute*, (2) ,20-30.]
- 储安平 (2005) .《英国采风录》.北京:东方出版社.
- [Chu,Anping (2005) .*Travel in the UK*. Beijing: Orient Press.]
- 邓绍根 (2015) .百年回望:美国《新闻记者信条》在华传播及其影响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0) ,11-27、126.
- [Deng,Shaogen (2015) . A study on the spread of Journalist' Creed and its 100 years of influence in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10) ,11-27、126.]
- 东方杂志 (1905) .论报馆之有益于国.《东方杂志》,2 (4) ,55-58.
- [Eastern Miscellany (1905) . On newspapers' benefits to the nation. *Eastern Miscellany*, 2 (4) ,55-58.]
- 独立周报 (1912) .事实与舆论.《独立周报》,(7) ,33-34.
- [The independent (1912) .Facts and public opinions, *The independent*, (7) , 33-34.]
- 范长江 (2001) .《<人民日报>的任务》.载范长江 (著) 、沈谱 (编) ,《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册) .北京:新华出版社.
- [Fan,Changjiang (2001) . The duty of People Daily.In Shen,Pu (ed.) ,*Collected journalism*

- works of Fan Changjiang* (//) .Beijing: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冯英子(1994).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2),73-77.
- [Feng,Yingzi(1994).My memory of Mr. Chu Anping. *The Yellow River*. (2),73-77.]
- 郭嵩焘(1984).《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
- [Kuo,Sun-Tao(1984). *London and Paris Diary*. Changsha:Yuelu Publishing House.]
- 郭箴一(1931).《上海报纸改革论》.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
- [Guo,Zhenyi(1931). *On the reform of Shanghai journalism*. Shanghai: Journalism Society of Fudan University.]
- 胡乔木(1992).《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载胡乔木(著),《胡乔木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Hu,Qiaomu(1992).Dissolve the illegal "National Congress" quickly. In Hu, Qiaomu (ed.), *collections of Hu Qiaomu's works (I)*.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胡乔木(1999).《关于新闻班讲义稿的谈话》.《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Hu,Qiaomu(1999).Talks about the handouts of journalism training. Editorial Board of biography of Hu Qiaomu (ed.), *Hu Qiaomu's speech on journalism and publishi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胡泳(1991).泰晤士报的历史沿革.《新闻研究资料》,(2),169-186.
- [Hu,Yong(1991).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imes. *Literatures of journalism research*, (2), 169-186.]
- 胡政之(2011).《我的理想中之新闻事业》.载方汉奇(主编),《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Hu,Zhengzhi(2011).My ideal of journalism.In Fang,Hanqi (ed.),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journalis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花之安(2012).《新闻纸论》.载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
- [Hua,Zhian(2012).On the newspaper.In Li Tiangang (ed.), *Selections from works in The Globe Magazine*. Shanghai: Zhongxi Books company.]
- 黄旦(200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1),24-37.
- [Huang,Dan(2003).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ews communic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definitions of "New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1), 24-37.]
- 黄旦(2011).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43(12),139-148.
- [Huang,Dan(2011).Medium is knowledge: the origin of China's modern press thought. *Academic Monthly*,43(12), 139-148.]
- 黄天鹏(1930).《中国新闻事业》.上海:上海联合书店.

- [Huang,Tianpeng (1930) .*Press of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United Press.]
- 黄天鹏 (2010) .《四十年来中国新闻学之演进》.载龙伟、任羽中、王晓安、何林、吴浩 (编) ,《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Huang,Tianpeng (2010) .Evolu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for 40 years.In LongWei,Ren Yuzhong,Wang Xiaolan,He Lin&Wu Hao (ed.) ,*The historical data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解放日报 (1942年11月17日) .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解放日报》.
- [Jiefang Daily (Nov.17,1942) .To the journalists and correspondents of Party newspapers. *Jiefang Daily*.]
- 解放日报 (1943年6月10日) .政治与技术.《解放日报》.
- [Jiefang Daily (June.10,1943)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Jiefang Daily*.]
- 军委联络部 (1954) .《欧美主要报刊及通讯社介绍》, 军委联络部.
- [PR Department of Military Committee (1954) . *An introduction to main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news agencies in Europe and US*, PR Department of Military Committee.]
- 康有为 (1981a) .《上清帝第四书》.载汤志钧 (编) ,《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
- [Kang,Youwei (1981a) .The Fourth letter to Emperor. In Tang Zhijun (ed.) , *Collections of Kang Youwei's political comments* (/)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康有为 (1981b) .《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 (代宋伯鲁拟) 》.载汤志钧 (编) ,《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
- [Kang,Youwei (1981b) .A report about building Shiwu Bao to Shiwo Guanbao. In Tang, Zhijun (ed.) , *Collections of Kang Youwei's political comments* (/)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梁启超 (1999)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载张品兴 (主编)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 [Liang,Qichao (1999) .On newspaper' s role in state affairs. In Zhang, Pinxing (ed.)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 林牧茵 (2013) .《移植与流变: 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 1921-195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Lin,Muyin (2013) .*Journalism education model of Missouri University in China: 1921-1952*.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林盼 (2012) .仰之几如泰山北斗——晚清中国报刊对英国《泰晤士报》的追崇与仿效.《新闻大学》, (1) ,21-27.
- [Lin,Pan (2012) .The praise and imitation of The Times in Late Qing China. *Journalism Bimonthly*, (1) ,21-27.]
- 凌遇选 (1937) .非常时期的新闻统制.《新闻杂志》, (创刊号) ,28-33.

- [Ling,Yuxuan (1937) .News control in harsh times. *Journalists Magazine*. (Inaugural issue) , 28-33.]
- 刘禾(2006).《跨语际实践: 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载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Liu,He (2006) ,Translingual practice: individual discourse across China and the West. In Xu,Jilin (ed.) ,*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20st century* (/)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Liu,He (2007)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30-1937* (Trans.)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刘锡鸿(1986).《英私记》.长沙:岳麓书社.
- [Liu,Xihong (1986) .*Private notes in the UK*.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 陆定一(1987).《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陈清泉、陶铠(编),《陆定一新闻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
- [Lu,Dingyi (1987) .Our basic ideas for journalism.In Chen, Qingquan& Tao,Kai (ed.) ,*Selected journalism works of Lu Dingyi*.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罗布特·麦肯齐(2002).《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880年).
- [Robert Mackenzie (2002)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
- 马星野(1938).战时民意与新闻纸.《民意周刊》,(49),4-5.
- [Ma,Xingye (1938) .Public opinion and newspapers in wartime. *Public opinion Weekly*. (49) ,4-5.]
- 马星野(1941).历史铸造者与金钱铸造者:论两类报纸.《世界文化》,3(1/2),91-94.
- [Ma,Xingye (1941) .The history founder and money founder: on the two kinds of newspapers. *World Culture*, 3 (1/2) ,91-94.]
- 马星野(1939).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建设.《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59-168.
- [Ma,Xingye (1941) . Journalism construction in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 *Youth China Quarterly*, (Inaugural issue) ,159-168.]
- 毛泽东.《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凯丰的信》,载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
- [Mao,Zedong (1983) .A letter to Kai Feng on the press and translation work. In CCCPC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Xinhua News Agency (ed.) ,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on journalism*.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民国汇报(1913).新闻界之革命.《民国汇报》,1(1),25-28.(原载于北京《亚细亚日

报》)

[Republic China Report (1913). *Revolution in journalism*. Republic China Report, 1 (1), 25-28.]

钱伯涵、孙恩霖 (1936). 《报馆管理与组织》. 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之二. 上海: 申报馆.

[Qian, Bohan & Sun, Enlin (1936).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ewspaper*.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Journalism Correspondent School of Shun Pao (II). Shanghai: Shun Pao Press.]

任白涛 (1938). 《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 新闻研究社.

[Ren, Baitao (1938). *News Propagand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News Research Organization.]

任白涛 (2011). 《应用新闻学》.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Ren, Baitao (2011). *Applied science of journalism*.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邵飘萍 (2008). 《新闻学总论》. 载肖东发、邓绍根 (编),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Shao, Piaoping (2008). *The Journalism Pandect*. In Xiao, Dongfa & Deng, Shaogen (ed.), *General instructions of Journal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舍我 (1930年11月18日). 在伦敦所见: 英国报界之新活动 (续). 《世界日报》.

[Cheng, Shewo (Nov. 18, 1930). What I saw in London: Changes in British Press (refer to the previous issue). *Shi-jie Jih-Pao*.]

舍我 (1931年1月14日). 在伦敦所见: 英国报界之新活动. 《世界日报》.

[Cheng, Shewo (Jan. 14, 1931). What I saw in London: Changes in British Press. *Shi-jie Jih-Pao*.]

申报 (1873年2月18日). 英国新报之盛行. 《申报》 (选录于《香港华字日报》).

[Shun Pao (Feb. 18, 1873). The popularity of new newspapers in Britain. *Shun Pao*.]

时报 (1999). 《<时报>发刊词》. 载张之华 (编),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 公元724页——1995年》.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Eastern Times (1999). Foreword to The Eastern Times. In Zhang, Zhihua (ed.), *Selected readings of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724-1995)*.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说难 (1912年9月1日). 论国民当养成抉择时论之能力. 《民立报》.

[Shuo, Nan (Sep. 1, 1912). People should develop the ability of discerning public opinions. *People's Independence Journal*.]

宋育仁 (1998). 《泰西各国采风记》. 载朱维铮 (编), 《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 北京: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Song, Yuren (1998). A collec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Zhu, Weizheng (ed.), *Six journals*

- of Kuo Sun-Tao and other ambassadors on the Wes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皖北山民尊虞氏（1902年9月2日）.论报馆与开民智之关系.《大公报》.
- [A Hillman (Sep.9,1902)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papers and enlightening on national wisdom. *Ta Kung Pao*.]
- 汪英宾（1999）.《中国报界应有之觉悟》.载陈桂兰（主编），《薪继火传:复旦大学新闻传播论文集 1929-199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Wang,Yingbin (1999) .The consciousness that Chinese press should have. In Chen Guilan (ed.) ,*A collection of Fudan University' s paper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王韬（2013）.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载海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Wang,Tao (2013) .The daily newspapers prevail in China.In Hai,Qing (ed.) , *Collections of Chinese modern thinkers. (volume of Wang Tao)*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吴恒炜（1999）.《<知新报>缘起》.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Wu,Hengwei (1999) .Foreword to The China Reformer.In Zhang,Zhihua (ed.) , *Selected readings of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724-1995)*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谢泳（2005）.《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 [Xie,Yong (2005) .*Chu Anping and The Observa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Press.]
- 徐宝璜（2008）.《新闻事业之将来》.载肖东发、邓绍根（编），《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Xu,Baohuang (2008)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In Xiao,Dongfa&Deng Shaogen (ed.) , *General instructions of Journal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徐宝璜，胡愈之（1924）.《新闻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
- [Xu,Baohuang& Hu,Yuzhi (1924) *Journalis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徐培汀，裘正义（1994）.《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 重庆出版社.
- [Xu,Peiting & Qiu Zhengyi (1994) .*A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徐新平（2002）.威廉的新闻道德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新闻大学》，（2），64-66.
- [Xu,Xinping (2002) .Water William' s press moral view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 *Journalism Bimonthly*, (2) , 64-66.]
- 严复（1996）.《<国闻报>缘起》.载卢云昆（编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Yan,Fu (1996) .Foreword to Kuo Wen Pao. In Lu,Yunkun (ed.) , *Social upheaval*

-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gulations: selected works of Yan Fu*.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 杨端六 (1921). 中国改造的方法. 《东方杂志》, 18 (14), 7-18.
- [Yang, Duanliu (1921). Way to transform China. *Eastern Miscellany*, 18 (14), 7-18.]
- 英敛之 (1902年12月22日). 拟仿英国泰晤士日报例各省偏设官报局以开风气说. 《大公报》.
- [Ying, Lianzhi (Dec.22,1902). My suggestion on starting state-run newspapers in provinces like The Times. *Ta Kung Pao*.]
- 于右任 (1986). 《答某君书》. 载傅德华 (编), 《于右任辛亥文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Yu, Youren (1986). Reply to Mr.X. In Fu, Dehua (ed.) *A collection of Yu Youren in the 1911 Revolutio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袁殊 (1931). 上海报纸之批评. 《新学生》, (3), 36-64.
- [Yuan, Shu (1931). Criticism of press in Shanghai. *The New Student*, (3), 36-64.]
- 詹文浒 (1946). 《报业经营与管理》. 南京: 正中书局.
- [Zhan, Wenhui (1946). *The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of newspaper*. Nanjing: Zhengzhong Book Company.]
- 张德彝 (1997). 《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8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Zhang, Deyi (1997). *A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Tales of Oversea Trip" (VIII)*.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 张季鸾 (1946). 《季鸾文存 (第二册)》. 天津: 大公报馆.
- [Zhang, Jiluan (1946).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Jiluan (II)*. Tianjin: Ta Kung Pao.]
- 张友渔 (1988). 《苏联的新闻和新闻政策》. 载王迪 (整理), 《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Zhang, Youyu (1988). Soviet Union's press and information policy. In Wang, Di (ed.) *Selected journalism papers of Zhang Youyu*.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章士钊 (2000a). 《政党政治与新闻》. 载章含之、白吉庵 (主编), 《章士钊全集 (第二卷)》. 上海: 文汇出版社.
- [Zhang, Shizhao (2000a). Party politics and news. In Zhang, Hanzhi & Bai, Ji'a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Shizhao (II)*. Shanghai: Wenhui Press.]
- 章士钊 (2000b). 《编辑部宣告》. 载章含之、白吉庵 (主编), 《章士钊全集 (第二卷)》. 上海: 文汇出版社.
- [Zhang, Shizhao (2000b). Declaration from the editorial office. In Zhang, Hanzhi & Bai, Ji'a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Shizhao (II)*. Shanghai: Wenhui Press.]
- 章士钊 (2000c). 《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 载章含之、白吉庵 (主编), 《章士钊全集 (第一卷)》. 上海: 文汇出版社.
- [Zhang, Shizhao (2000c). On the urgency of organizing News Trusts. In Zhang, Hanzhi & Bai, Ji'a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Shizhao (I)*. Shanghai: Wenhui Press.]
- 章士钊 (2000d). 《伦敦泰晤士报之页数》. 载章含之、白吉庵 (主编), 《章士钊全集 (第一

- 卷)》.上海:文汇出版社.
- [Zhang, Shizhao (2000d). The pages of The Times. In Zhang, Hanzhi & Bai, Ji'a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Shizhao* (1). Shanghai: Wenhui Press.]
- 章太炎(1977).《实学报叙》.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 [Zhang, Taiyan (1977). Foreword to The Real Learning Newspaper. In Tang, Zhijun (ed.), *Selected works of Zhang Taiyan's political comments*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赵晓兰(2011).《传教士中文报刊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Zhao, Xiaolan (2011). *A history of the Missionaries' Chinese Pres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赵占元(1937).《国防新闻事业之统制》.上海:汗血书店.
- [Zhao, Zhanyuan (1937). *Control of the defensive journalism*. Shanghai: Hanxue Bookstore.]
- 郑观应(2013a).《日报上》.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 [Zheng, Guanying (2013a). Daily newspaper: I. In Xia, Dongyuan (ed.), *Dangerous remarks in prosperous times*.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郑观应(2013b).《日报下》.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 [Zheng, Guanying (2013b). Daily newspaper: II. In Xia, Dongyuan (ed.), *Dangerous remarks in prosperous times*.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筑髓(1903).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浙江潮》,(4),13-20.
- [Zhu, Sui (1903). On the power of press and its organization in Europe and US. *Zhejiang Tide*, (4), 13-20.]
- 卓南生(2015).《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Zhuo, Nansheng (2015).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ress 1815-1874*.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